资源禀赋、资产性收益与产业扶贫
——多案例比较研究

梁琦[1]，蔡建刚[1,2]

(1.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275；2. 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确保贫困户的资产性收益是提升产业扶贫绩效的重要举措。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产业类型、投资者类型和贫困户在内的理论框架，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比研究产业扶贫的实施逻辑和要点。研究表明：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型产业比市场需求型产业具有更高的扶贫绩效，内部投资者比外部投资者更具有脱贫减贫的倾向，而资产性收益的不同支付方式会产生较大的效用差异。对此，贫困地区政府首先要以资源禀赋为基础选择产业项目，其次要确保政府资金的合理应用，最后要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从而提升产业扶贫实效。

关键词：资源禀赋；资产性收益；产业扶贫；多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7)04−0085−08

一、引言

贫困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最为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将脱贫、减贫视为重要的发展目标，贫困理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收入贫困到能力贫困、权力贫困，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客观贫困到主观贫困，从单一维度的贫困到多维贫困，贫困的内涵被不断挖掘和深化[1]；阿马蒂亚·森、安格斯·迪顿等多位经济学家也因为在贫困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而获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贫困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话题，而中国的贫困现象和扶贫战略也成为国内外学者重点研究的对象[2−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扶贫(1949—1977 年)、制度性变革引发的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1985 年)、高速经济增长背景下以区域性瞄准为主的开发式扶贫(1986—200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扶贫开发(2001—2010 年)①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精准扶贫(2011 年至今)等五个阶段，并形成了由生存型反贫政策、支持型反贫政策和开发型反贫政策三个方面构成的政策体系[4]。与生存型反贫和支持型反贫旨在解决最低的反贫需求不同，开发型反贫或扶贫旨在实现脱贫致富，它更加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精神和要求，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的基本取向，而产业扶贫则是开发型扶贫的最主要模式。

研究表明，产业扶贫是一种“开放式+造血式”扶贫模式，它能提升贫困地区群众的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区域人口脱贫致富，对于改进欠发达区域的“久扶不脱贫”困境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同时，产业扶贫还能有效缓解贫困地区脆弱生态环境面临保护与发展的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4−5]。正因为此，产业扶贫被列为精准脱贫“五个一批”工程的首要任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和《“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均对“产业扶贫”作出了重要指示，而全国各地也积极开展了产业扶贫的探索，涌现出了龙成模式、攀枝花模式、天耀模式、晴隆模式等一批富有特色且卓有成效的产业扶贫模式。然而，在各地的实践中，产业扶贫也带来了诸如扶贫目标偏移、农民对身边党政工作和形象不认可、村庄原子化溃败加速以及农户获取扶贫资源的权利和机会受到剥夺等一系列问题[6−7]；甚至在产业扶贫的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都有差异。李博和左停[8]研究指出，产业扶

收稿日期：2017−04−10；**修回日期**：2017−06−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中国扶贫开放战略和政策的评估与优化”(71541042)；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博导类项目“产业转移的资源空间配置效应——基于企业视角的考察”(20130171110043)

作者简介：梁琦(1957−)，女，湖南涟源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产业集聚与空间经济；蔡建刚(1984−)，男，浙江诸暨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管理

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许汉泽和李小云[4]研究表明，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在产业完成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等问题。在一系列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由于贫困户面临融资难、得不到规范的信贷服务等问题，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的范围和程度较低，自身的发展能力也没能得到有效提升，在产业开发中逐渐被边缘化。此外，由于势力的不对等，产业扶贫的利处大多被投资者或开发商圈走，贫困户为产业扶贫项目提供的土地、房舍等资产往往享受不到合理的收益，产业扶贫在有效维护和提升农民利益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失能和弱能者没有从产业扶贫项目中得到实质性利处，这便失去了产业扶贫的应有之义。

为了进一步提升扶贫实效，产业扶贫过程中必须保障贫困户的资产性收益。对此，国务院于 2016 年 9 月启动了资产收益扶贫改革试点工作，探索通过资产性收益的保障以推动扶贫工作的长效机制；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多个文件也就资产收益扶贫给出了指导性意见，把资产收益扶贫作为实施产业扶贫的重要政策手段。一时间，资产性收益与产业扶贫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现有的相关文献资料更多的是报纸文章或评论报道，又或者是扶贫经验和模式的介绍，缺乏规范的理论研究，在产业扶贫的逻辑前提、运作机制以及与资产性收益的作用机理等探讨上还涉及不够，需要强化研究。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框架，规范分析产业扶贫的运作机制，并遵循规范的案例研究范式，选取湖南省张家界市 3 个典型的产业扶贫项目作为研究案例，对比分析项目的执行情况与内在差异，以检验理论框架的正确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措施，以期为我国产业扶贫与资产收益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经验参考和智力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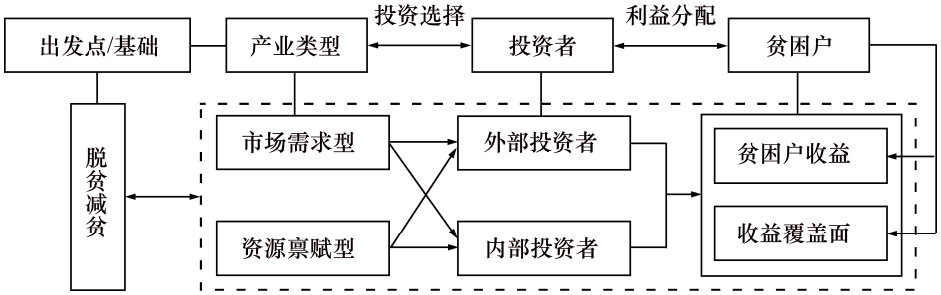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开展产业扶贫首先要有项目，即选择具体产业。由此，产业选择理论成为产业经济和区域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是产业选择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他关于产业选择的思想被后人称为“罗斯托基准”。罗斯托[9]在《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一书中就指出，应该选择具有较强扩散效应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通过扩散效应将主导产业的优势辐射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Hirchman)[10]也对产业选择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主导产业选择的基准。他认为应该选择产业影响广度大、带动效应大的产业作为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必须与其他产业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技术支持。这一思想即“赫希曼基准”，也被称为关联效应标准。赫希曼基准的出发点在于，由于不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不足以及扩大资本形成能力的要求相当迫切，在这种情况下，基础产业的成长要靠市场需求带动供给。因此，可以把赫希曼基准理解为以需求带动供给增长的不平衡结构的选择战略。此外，由李嘉图(Ricardo)创立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无疑为产业选择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理论支持。Spence、Jones and Romer 研究表明，在产业发展中，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无论是在本国还是在世界市场上，其竞争力都是最强的[11−12]；而钱力和管新帅[13]在对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优势产业选择以及宋月莹[14]在对西部贫困地区工业园区产业选择研究时，均强调了资源禀赋的重要地位。

上述理论虽然主要针对区域的主导产业选择，但也为贫困地区产业扶贫项目的选择提供了有益参考，特别是赫希曼基准所倡导的市场需求型产业以及比较优势理论所倡导的资源禀赋型产业已经成为贫困地区产业扶贫项目选择的重要类型，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考量，本文以脱贫减贫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产业类型选择为基础，通过不同类型投资者的特征和行为比较，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投资者类型下的产业扶贫效果，从中提炼出产业扶贫的实施逻辑和要点，并提出产业扶贫开展中需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本文将产业分成两种类型，即市场需求型和资源禀赋型。其中，市场需求型产业以市场为导向，产品往往具有较大的社会需求，但并不一定和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相适应；资源禀赋型产业以贫困地区的气候、资源等为依托，产品生产与当地的条件相适应，但并不一定有好的销路，或者因交通不便、产量较小等原因，导致外界对其了解程度较低。

产业需要有专门的投资者来投资，产业扶贫的规



注：贫困户收益主要由资产性收益和劳动力价格两部分构成

图 1　理论框架图

模经济效应才能体现出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倾斜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断增强，农村地区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不仅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公益事业投资在农村地区，而且更多的投资者也将目光瞄向农村地区，将其视为重要的目标市场；同时，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的掀起以及国家对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支持意见的发布，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成为贫困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为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注入了不竭动力。在多个因素的共同促进下，贫困地区的投资者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为了简化分析但又不失一般性，本文将投资者分成外部投资者和内部投资者两类。其中，外部投资者为贫困地人口之外的投资者，与贫困地的人和政府没有近亲的地缘关系，一般通过市场化的契约行为与贫困地发生联系，其往往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先进的产业技术以及较为雄厚的资本，体现出专业性和资本性；内部投资者为贫困地的村民或当地政府，一般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返乡创业人员。内部投资者虽然在管理、技术、资本等方面不及外部投资者，但具有天然的“群众基础”，在处理地方政府关系、发动村民积极参与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体现出地方性和小农性。

于是，投资者类型和产业类型之间就形成了 4 种组合，即外部投资者投资市场需求型产业(T1)、外部投资者投资资源禀赋型产业(T2)、内部投资者投资市场需求型产业(T3)和内部投资者投资资源禀赋型产业(T4)。可以想象，每种组合的扶贫绩效是有差异的。不管是何种组合形式，投资者需要将产业发展的收益分配给贫困户，从而体现产业扶贫的本质要求。从脱贫减贫的目标出发，对于贫困户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贫困户的收益，二是获益贫困户的多少，即收益覆盖面。在产业扶贫过程中，贫困户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参与产业的发展：一种是提供土地、房舍等资产供投资者使用，另一种是作为员工为投资者提供劳动和服务。基于此，本文将贫困户的收益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贫困户提供土地、房舍等资产所获得的租金，即资产性收益；另一部分是贫困户由于雇佣关系参与产业的经营和运作而获得的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

那么，贫困地区到底应该如何选择产业类型和投资者？到底哪种组合形式能带来更多的贫困户收益和更高的收益覆盖面，即具有更高的扶贫绩效呢？毋庸置疑，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对产业选择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对欠发达国家或贫困地区而言，又或者对产业选择的初期而言，资源禀赋学说的应用更为广泛。林毅夫[15−16]认为，一国或地区应该选择最符合自身要素禀赋的产业、技术和产品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Frederick[17]在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时指出，乡村旅游必须建立在乡村现有的历史古迹、山脉以及其他自然风景、宜人的气候或干净的空气等舒适物的基础之上，不然，这些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将是微不足道的；张慧君[18]认为，产业扶贫应立足于当地的资源禀赋条件，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徐翔和刘尔思[19]研究指出，产业扶贫要以资源开发为基础，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的经营机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外部投资者有攫取经济利益的倾向，不利扶贫目标的实现。以乡村旅游扶贫模式为例，旅游开发往往以外部投资者为主，不仅造成乡村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还造成村民与外来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矛盾和危机。一方面，有较好位置的经营场所或成为旅游公司职员的村民将直接获益，且收益较高；而无固定经营场所或无法参与乡村旅游的村民将难以获益，这就造成村民内部的重新分层。另一方面，不少外部投资者将村民排斥在外，村民的参与程度较低，无法脱离原有的贫困状态；而对将自己排斥在外，又利用其传统文化进行旅游开发时，更是充满了敌对情绪[20]。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在产业扶贫过程中，资源禀赋型产业比市场需求

型产业更具发展优势，而内部投资者比外部投资者更愿意维护贫困户的资产性收益，从而推动扶贫工作取得实效。总体上，在投资者与产业 4 种组合类型中，内部投资者投资资源禀赋型产业(T4)的扶贫绩效高于其他 3 种组合类型。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是指综合运用历史数据、档案材料、访谈、观察等多种收集数据和资料的技术与手段，对某一背景下的特定社会单元(个人或团体组织)中发生的典型事件的背景、过程进行系统地、综合地描述和分析，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解释、判断、评价或者预测[21]。作为一种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案例研究适合对现实中某一复杂和具体的问题进行深入和全面的考察，可以对某些现象、事物进行描述和探索，可以对现存的理论进行检验、发展或修改，还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现实生活有意义的特征[22−23]。目前，案例研究被广泛应用于商业与市场营销、教育等多个领域，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考虑到整个区域的产业扶贫数据不易获取、资产收益扶贫的试点工作才刚刚开展等因素，而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又属于“怎么样”和“为什么”类型的问题，符合案例研究的适用领域。同时，与单一案例研究相比，通过多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加具有有效性和稳定性[24]。因此，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且通过多个案例的比较来分析产业扶贫的逻辑与实施要点问题。

(二) 研究对象选择

案例研究虽然无需进行规范的实证数据分析，但所选择的样本必须具有足够的典型性和代表性[25]。为此，本文在选择案例时重点考虑了以下几个原则：①在全国最典型的扶贫地区进行选择，且所有的产业扶贫项目都集中在一个城市；②所选择的样本应是当地重点的产业扶持项目，且样本经验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③所选择的样本应分属于不同的产业类型，即不选择既是市场需求型又是资源禀赋型的产业；④所选择的样本应全面反映本文理论框架中的所有要素，但样本数量不宜过多，一般为 3~6 个。

遵循上述原则，再考虑到调研的便利性，首先，将样本选择区域界定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隆起与洞庭湖沉降区结合部，是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重要构成，其所辖的桑植县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肩负着减贫和脱贫的重任。其次，通过张家界市经信委、发改委、农委等相关政府部门初步了解了全市产业扶贫项目的基本情况，并按照案例选择原则，确定符合条件的产业扶贫项目。最后，与初步入选的产业扶贫项目的经理或负责人进行联系，在对其进行初步访谈的基础上，选择市场前景较好的项目作为进一步调研的对象。最后，结合样本之间的可比性原则，选择 3 个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产业扶贫项目作为本文最终的研究案例。

(三) 方案设计

本文按照 Yin 的多案例研究的基本步骤开展研究(如图 2 所示)，围绕理论框架，明确研究的问题，并根据研究假说和研究对象的性质，确定访谈提纲。为了确保案例研究的高信度和高效度，本研究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①成立包括副教授 1 人、讲师 2 人、硕士研究生 3 人在内的案例研究小组，多元化的职称结构、研究视角和知识背景可以减少研究者的主观偏见，提升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正确性；②在外出调研前，案例研究小组的成员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集中学习，就案例研究方法的相关内容以及本文写作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进行了辅导和说明，以保证每个成员都熟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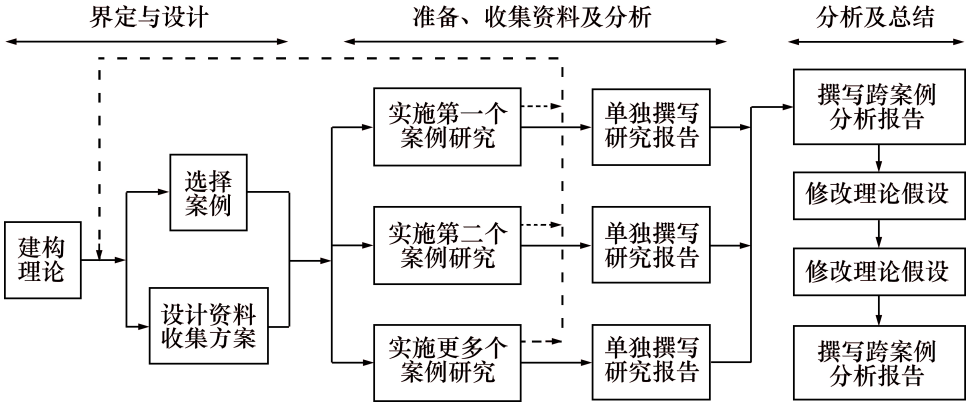


图 2 Yin 的多案例研究的基本步骤

案例研究方法的使用，熟悉本次调研的目的；③每次外出调研，案例研究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全程参与，调研所获得的数据资料都由 3 位硕士研究生于调研当天做好整理和处理，并各自提出观点和看法，进行反复讨论。同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时间跨度，并增强样本之间的可比性，所有调研工作均在 2016 年 11 月份完成。

为了使调研工作更具目的性和效率性，每次外出调研前 1 天，研究小组都会和相关人员进行电话联系，简单介绍调研的目的以及想要获取的信息资料，让被访谈者做好较为充分的准备。访谈时，访谈提纲以开放式问题为主，但不局限于访谈提纲，研究小组会根据被访谈者的回答情况进行追问，也会积极回答被访谈者提出的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以便收集到更深层次的信息，获取最真实的观点和想法。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以及记录的统一性，研究小组安排了专人做笔记，并在允许的情况下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对于整理后的访谈记录还通过 E-mail 的形式向被访谈者进行信息确认。此外，研究小组在每次访谈结束后都会对项目现场进行参观，并将项目的相关文字资料悉数带回，以加深对项目的印象。

四、案例分析

(一) 案例基本情况

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以及案例选择的原则，在两轮调研的基础上，本文最终选择 3 个产业扶贫项目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应产业扶贫项目负责人要求隐去合作社的名称和被访谈者的姓名，故在案例的分析过程中，所选择的 3 个产业扶贫项目分别以 A、B、C 表示。这 3 个项目均是当地重点扶持的对象，场地均是租用了贫困户的土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中，A 和 B 两个项目均是基围虾养殖项目，属于市场需求型产业，但投资者分别为外部投资者和内部投资者；C 项目是茅岩莓茶种植项目，属于资源禀赋型产业，其投资者是内部投资者。3 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二) 同一产业类型下不同投资主体的扶贫绩效比较

选择相同的产业类型，可以比较不同的投资者类型以及生产运营模式下的扶贫绩效差异。项目 A 和项目 B 同属于市场需求型产业，且都从事基围虾的养殖，具有很强可比性。基围虾的学名为南美白对虾，原产于美洲太平洋沿岸水域，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对虾养殖优良品种之一。基围虾的生长速度快，是广盐性的虾类，适合咸淡水水域养殖。张家界属于内陆地区，交通运输业不是特别发达，在市面上几乎没有鲜活的海鲜类产品可买，甚至在高档的酒店都很难品尝到新鲜的基围虾。长期以来，张家界的市民只能食用冻虾，而且要支付高昂的价格。据估算，张家界市每年的基围虾需求量在 100 吨以上，可以说市场需求很大，极具推广、发展的前景。

基围虾在内陆地区的养殖具有较大的技术含量，虾苗盐度淡化、培水、调水、控水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项目 A 是由外部投资者发现商机后，带着较为成熟的养殖技术以及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于 2015 年年底注册成立了专业

表 1　研究案例基本情况

类目	研究对象		
	项目 A	项目 B	项目 C
产业类型	市场需求型	市场需求型	资源禀赋型
投资者类型	外部投资者	内部投资者	内部投资者
立项时间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
主要产品	基围虾	基围虾	茅岩莓茶
运营模式	合作社+基地+农户+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	合作社+基地+农户+龙头公司
项目规模	社员 20 人； 基围虾养殖面积 80 亩； 年产基围虾 40 万斤	社员 128 人； 基围虾养殖面积 60 亩； 年产基围虾 18 万斤	社员 1 800 人； 茅岩莓人工种植原茶基地 3 356 亩； 生产车间及厂房面积 23 460 m^2； 年产茅岩莓保健茶 200 万盒
资产性收益	现金支付，每亩 600 元/年	实物支付，每亩 700 斤大米/年	田地入股，年终分红
贫困人口数	10 人	76 人	1 500 人
贫困户参与率	50%	59.38%	83.33%

的养殖合作社和水产公司，该项目实现了“海虾淡养”在张家界的首获成功。从此，张家界市民可以“足不出户”就在家门口品尝到鲜虾的味道，农副产品市场上以土货为主导的产品格局也被彻底打破。目前，A 项目实行“合作社+基地+贫困户+公司”的运营模式，有社员 20 人，其中投资者及其自带的员工就有 10 人，另外 10 人为当地的贫困户，贫困户参与率为 50%，收益的覆盖面相对较小。基围虾的养殖面积有 80 亩，年产基围虾 40 万斤，而所用的场地是租用贫困户及其亲属的稻田，一亩田的年租金为 600 元，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同时，在基地工作的贫困户可获得每月 1 250 元的收入，这也是张家界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项目 B 是由当地退伍军人在广东沿海一带学习了先进技术后，于 2016 年初成立的合作社。目前，B 项目实行“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运营模式，没有企业的参与；现有社员 128 人，是 A 项目的 6 倍多，其中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有 76 人，贫困户参与率为 59.38%，高出 A 项目近 10 个百分点。基围虾养殖面积约 60 亩，年产基围虾 18 万斤，所用的场地也是租用的贫困户的稻田，但租金的支付形式不同。B 项目以每亩 700 斤大米的形式支付年租金，以每斤 1 元的最低价计算，一亩田的年租金就是 700 元，高出 A 项目 100 元。同时，在合作社工作的贫困户也能获得每月 1 250 元的最低工资。因此，无论是从贫困户的收益量看，还是从贫困户的收益面看，B 项目的扶贫绩效都要高于 A 项目。

究其原因，虽然 A 项目从生产率上来讲远远高于 B 项目，但外部投资者以及外部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本质致使其在收益的分配上不会过多地顾及贫困户的利益。无论是在员工的福利发放上，还是在对人的关怀上，外部投资者都不及内部投资者有人文情怀；同时，与内部投资者更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相比，外部投资者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方面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在与贫困户的访谈中得到了证实。特别是在资产性收益的支付形式上，B 项目以食物的形式支付，真切地关注到了贫困户的真实需求，具有极大的激励和稳定作用。

(三) 不同产业类型下相同投资主体的扶贫绩效比较

选择相同的投资者类型，可比较不同的产业类型以及生产运营模式下的扶贫绩效差异。项目 B 和项目 C 虽然都由内部投资者投资，但分属于市场需求型产业和资源禀赋型产业，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产业形式。茅岩莓为显齿蛇葡萄藤本植物，其嫩叶中二氢杨梅素等黄酮类活性成分含量高达 43.78%，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总黄酮含量最高的中药材，有“黄酮之王”的美誉。澧水上游的茅岗地区，是茅岩莓的原产地，其地处湖南天泉山国家森林公园、峰峦溪国家森林公园，土壤、气候生态条件优越，森林和草地覆盖率在 85% 以上，十分有利茅岩莓的生长及高黄酮品质的形成。因此，C 项目是典型的资源禀赋型产业。

C 项目是由当地专门从事茅岩莓茶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企业家于 2016 年成立的专业合作社，目前实行“合作社+基地+贫困户+龙头公司”的运营模式；现有社员 1 800 人，其中贫困户 1 500 人，贫困户参与率达 83.33%；现有茅岩莓人工种植原茶基地 3 356 亩，产地初加工及精深加工生产车间及厂房面积 23 460 m^2，年产茅岩莓保健茶 200 万盒。所有的场地均为贫困户的田地，贫困户以田地入股，年终可以获得分红，这种形式的资产性收益更能激发贫困户的劳动热情，也更能保证贫困户的高收益，实现了投资者与贫困户的双赢。在这种模式下，贫困户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角色，其没有月收入，但通过入股与劳动可获得年终分红，好比是年薪制。此外，C 项目还带动了周边两乡一镇共 31 个村的经济发展，其中省级贫困村就有 16 个，而莓茶种植户从原来的 19 户也增加到了 57 户，体现出强大的带动作用。

与 B 项目相比，C 项目的技术含量更低，“土生土长”的产业能更加广泛地发动贫困户参与到项目的建设与实施中来。由于参与面广、参与度高，地方政府又竭力地宣传和推广，并积极打通销售环节，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将茅岩莓茶产业作为地方的龙头产业来打造，从而开辟一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

综上，本文提出的假说基本得到了验证。一方面，资源禀赋型产业更具有群众基础，贫困户可以在该产业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比市场需求型产业更具有发展优势；另一方面，内部投资者本能的故土情节以及先天的环境优势，使其比外部投资者更愿意造福地方，也更能动员贫困户“自力更生”，而这就是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的重要一环。基于此，内部投资者投资资源禀赋型产业将带来更高的扶贫绩效。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 3 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基于市场需求开展的产业扶贫项目，虽然能够使整个项目产生较大的经济收益，但扶贫的效果不如资源禀赋型产业。一方面，依托市场需求形成的项目往往不是当地老百姓所非常熟悉的事物，会有“望

而生畏”的感觉；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型产业往往不是地方的优势产业，地方也不能在资源、环境等多方面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很难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既是资源禀赋型产业，又属市场需求型的产业将带来更大的扶贫绩效。事实上，项目 C 在最初开发时就已经做了大量的市场需求调查和分析，虽不属于完全的市场需求型产业，但是在一定市场需求的支持下开展的。

(2) 相比外部投资者而言，内部投资者更具有脱贫、减贫的倾向和激励，更能发动贫困户参与到脱贫、减贫的事业中来。由于外部投资者带有更多的获利动机，公益性成分会相对较小，加上其对人员、环境等不够熟悉，在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发动贫困户参与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而内部投资者处于对家乡的热爱，其在带动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过程中更具有成就感。

(3) 对于资产性收益，不同的支付形式会产生较大的效用差异。相对而言，通过资产登记入股，让贫困户参与经营并按股分红，更能激发贫困户脱贫、减贫的积极性，真正参与到脱贫致富的事业中来。除此之外，从贫困户的真实需求出发，以大米等物质的形式补偿其资产的出让比简单的现金发放形式更能让贫困户得到实惠，也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情怀。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贫困地区政府在开展产业扶贫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政府在引进或者策划产业扶贫项目时，需要充分考虑地方的资源禀赋和生产经营条件，不能单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并以贫困户利益的提升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重点选择对贫困户有强带动力、高参与度且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产业项目，从而确保贫困户直接受益、确保投资项目风险可控、确保投资收益稳定持续。

第二，政府要大力发动本地企业家或者返乡人员积极投身家乡的建设，为脱贫致富事业添砖加瓦。为此，政府要确保国家财政资金的足量投入，确保贫困户的资产性收益，在遵循“政府配置扶持资金、市场配置社会资本”的基本原则下，让政府资金做到“资金跟扶贫走、扶贫跟能人走、能人跟项目走、项目跟市场走”。

第三，政府要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提供切实保障。产业扶贫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很好的资源禀赋，但简单的拥有资源不足以发展经济。地方政府要围绕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公路、物流系统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在制度建设上下足功夫，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本文虽然就产业扶贫的逻辑与实施要点进行了尝试性探索，得出了一些经验性结论，但案例的选取均来源于同一地区，特殊性较强，不利于从个案经验中抽象出更为一般化的规律，也就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同时，案例均是近一两年来的项目，没有过多的数据进行年度的纵向比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要扩大样本案例的来源和数量，以体现普遍性和推广性；另一方面，要跟踪项目的年度数据，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正确性。

注释：

① 张磊在其著作《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1949—2005 年)》中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扶贫开发”阶段的时间界定为2001—2005年，这与其著书的年份和考查的时间跨度有关。考虑到我国扶贫开发政策的实际情况以及时间的延续性，本文将该阶段时间调整为 2001—2010 年。

参考文献：

[1] 丁建军. “认知税”: 贫困研究的新进展[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2(3): 152−158.

[2] Montalvo J G, Ravallion M. The pattern of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0, 38(1): 2−16.

[3] Liu Y, Liu J, Zhou Y.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 52: 66−75.

[4] 许汉泽, 李小云.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 9−16.

[5] 王春萍, 郑烨. 21 世纪以来中国产业扶贫研究脉络与主题谱系[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6): 145−154.

[6] 黄承伟.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 评述与展望[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5−17.

[7] 周常春, 刘剑锋, 石振杰. 贫困县农村治理“内卷化”与参与式扶贫关系研究——来自云南扶贫调查的实证[J]. 公共管理学报, 2016, 13(1): 81−91.

[8] 李博, 左停.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 Y 村大鹏蔬菜产业扶贫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2(4): 66−73.

[9] Rostow W W. 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 growth: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63.

[10] Hirschman A O.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8.

[11] Spence M.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 d inclusive development[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

ications, 2008.

[12] Jones C I, Romer P M. 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 2(1): 224−245.

[13] 钱力, 管新帅. 农业优势产业选择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以甘肃省民族地区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3): 103−108.

[14] 宋月莹. 西部贫困地区工业园区产业选择与发展模式研究——以定西经开区为例[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6.

[15] 林毅夫.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J]. 中国改革, 1999(8): 14−16.

[16] 鞠建东, 林毅夫, 王勇. 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 经济学(季刊), 2004, 4(1): 27−54.

[17] Frederick M. Rural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993, 7(2): 215−224.

[18] 张慧君. 赣南苏区产业扶贫的“新结构经济学”思考[J]. 经济研究参考, 2013(33): 65−72

[19] 徐翔, 刘尔思. 产业扶贫融资模式创新研究[J]. 经济纵横, 2011(7): 85−88.

[20] 王建云. 案例研究方法的研究述评[J].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13(3): 77−82.

[21] 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32−550.

[22] 罗伯特·K.殷. 案例研究: 设计与方法[M]. 周海涛, 李永贤, 李虔,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23] Miles M B, Huberman A M.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4.

[24] 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32−550.

Resources endowment, asset returns and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any cases

LIANG Qi[1], CAI Jiangang[1,2]

(1.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Ensuring assets returns of the poor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performan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buil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industrial types, investor types and the poor, and 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multi-case study, the present essay undert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ogic and key points of implemen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dustry of resources endowment has a higher performance than the industry of market-driven in poor areas, that internal investors have a tendency to escape poverty reduction compared with outside investors, and that the different payment methods of asset returns will produce a large differences of utilities. So, the government in poor regions should first select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resources endowment, then ensure the proper use of government funds, and finally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resources endowment; asset returns;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study of many cases

[编辑: 谭晓萍]